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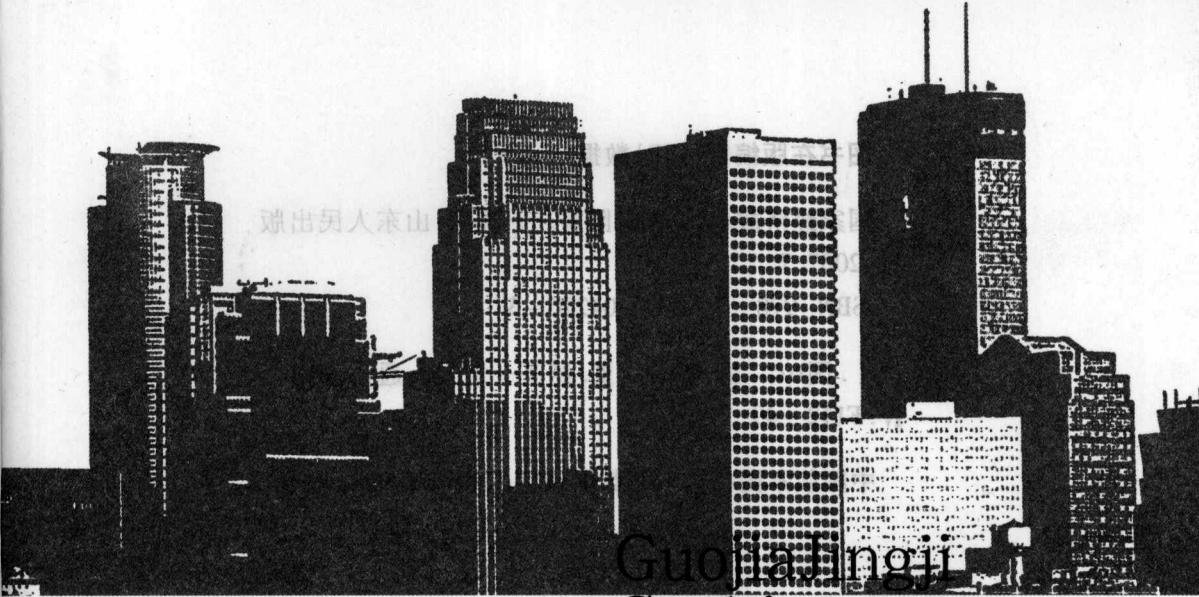
Guojia Jingji Gushi

本书以国家为背景，在阐述与该国家有关的经济故事后，论述相关的经济理论，并联系中国发展的情况展开讨论。每一个国家经济故事都非常有趣，如“荷兰病”。“荷兰病”是一种经济“富贵病”，说来饶有趣味。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当时人们突然发现荷兰海岸线蕴藏巨量天然气。接下来的天然气开采，使荷兰一夜间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则逐步萎缩。意外的财富使荷兰的创新动力逐渐消退。意外的财富使荷兰的创新动力逐渐消退。意外的财富使荷兰的创新动力逐渐消退。意外的财富使荷兰的创新动力逐渐消退。全书有20多个经济故事，内容非常丰富。



国家 经济 故事

辛向阳 著



Guojia Jingji
Gushi

國立森·甘

國立森·甘

國立森·甘

國立森·甘

國立森·甘

國立森·甘

國立森·甘

國立森·甘

國立森·甘

中国出版集团大中华书局
地圖出版社
書名：國家經濟故事
作者：辛向陽
網址：<http://www.sq-book.com>

ISBN 978-7-5080-2500-8

开本：16开(170mm×230mm)

印张：9.5

字数：200千

版次：1

印数：1-2000

ISBN 978-7-5080-2500-8

元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经济故事 / 辛向阳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209 - 04270 - 3

I. 国… II. 辛… III. 经济—世界—通俗读物
IV. F112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9290 号

责任编辑:董新兴 陈丹丹

封面设计:蔡立国

国家经济故事

辛向阳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70mm × 230mm)

印 张 9.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5000

ISBN 978 - 7 - 209 - 04270 - 3

定 价 1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8)8261018

目 录

“荷兰病”：什么病？	001
荷兰奇迹：一个创新型国家的经典案例	005
捷克现象与中国股市	008
越南道路与越南奇迹：背后的故事	010
“金砖四国”与群体崛起	019
阿根廷：请不要为我哭泣	024
“古巴之谜”的启示：医疗体制改革何处去？	030
东亚奇迹与东亚金融危机：政府的双面性	035
英国工业革命：奇迹如何出现？	040
欧洲的和平崛起：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启示	043
欧美的社会经济：对于中国的启示	053
德国模式与德国奇迹	060
联合国全球契约：从经济动物到企业公民	065
爱尔兰的奇迹：从酒馆之国到财富之域	069
日本奇迹：一个半世纪的轨迹	074
汉江奇迹与韩国崛起	087
拉美化：命题背后的秘密	090
从秘鲁现象说行政成本	096
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101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104
西班牙、葡萄牙：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107
瑞典模式：从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	110
北京共识：世界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114
北京奥运：人文奥运与构建和谐社会	121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与优越性	1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和平论”	136
中南海的学习：中国崛起的组织机制	141
后记	148

“荷兰病”：什么病？

人们把“因富得祸”这类现象称为“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

“荷兰病”的典型病症就是一个部门繁荣，而其他领域萎缩。其基本症状是：自然资源丰富，且自然资源售价较高，国家获了丰厚的利益；没有强大的对自然资源的下游加工能力，只得靠出售原材料来获取利益；服务业畸形发展，消费型服务业发展很快；而生产性服务业则发展滞后，服务业的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和自然资源部门获得的利益不能在本地区或本国转化为制造业或其他产业的投资，而是在其他地区或国家进行挥霍性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拉高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使民众深受其害。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荷兰病”比比皆是。如何避免“荷兰病”？请看下文介绍。

没有资源的荷兰人在17世纪创造了荷兰奇迹。而300年后有了资源的荷兰人却得了“荷兰病”。

荷兰病是一种经济“富贵病”。说来也是饶有趣味。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人们突然发现荷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接下来的天然气开采，使荷兰一夜间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则逐步萎缩。意外的财富使荷兰的创新动力逐渐消失，最终在多方面失去了国际竞争力。由于这一经历，人们随后把“因富得祸”这类现象称为“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荷兰病”的典型病症就是一个部门繁荣，而其他领域萎缩。产生的原因是，通过大量出口初级产品获得了巨额外汇收入，外汇收入通过两种路径引起汇率上升。一种路径是，外汇的大量流入引起外汇价格的下降，使本国货币币值上升；第二种路径是，出口收入的增加造成对商品、服务需求的增加，同时劳动者工资收入迅速上升，导致进口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提高。这两种路径最终使汇率上升，而汇率上升将降低除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以外的其他出口产品生产部门的竞争力，阻碍其他部门的生产，并对经济的整体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W.M.Corden（戈登）和J.Peter Neary（皮特·

尼尔利)在1982年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现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不过对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荷兰病表现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最终使得制造业衰落,服务业畸形繁荣。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如Sachs(萨克斯)等人已经通过比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价格的变动来验证这个命题。

“荷兰病”的基本症状是:1.自然资源丰富,且自然资源售价较高,国家获得了丰厚的利益;2.没有强大的对自然资源的下游加工能力,只得靠出售原材料来获取利益;3.服务业畸形发展,消费型服务业发展很快,而生产性服务业则发展滞后,服务业的结构不合理;4.服务业和自然资源部门获得的利益不能在本地区或本国转化为制造业或其他产业的投资,而是在其他地区或国家进行挥霍性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拉高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使民众深受其害。

“荷兰病”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资源越多,国家越穷。这种“诅咒”的情况比比皆是:历史上的“诅咒”就是西班牙,现实中的“诅咒”就是俄罗斯。

16、17世纪的西班牙就是“历史诅咒”的经典案例。在征服了中、南美洲并使这些盛藏黄金、石油资源的国家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之后,西班牙

一下子获得巨大的意外之财。那时的西班牙帝国只知道尽情挥霍，而不是在殖民地以及其本国利用“富”来造富。在消耗完来自殖民地的金银财宝之后，到17世纪末，西班牙皇室已是债台高筑，濒于破产。而葡萄牙的情形与西班牙有惊人的一致性。

现实的经典例子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它的发展却是举步维艰。2005年5月16日的美国《商业周刊》发表文章，题目为“高价石油的灾难”。文章讲：由于原油价格在每桶50美元上下波动，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世界第二大产油国俄罗斯大把地赚取石油美元。2005年，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入大约为900亿美元，2006年超过1395亿美元。但是，没有人比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更担忧此事的了。他认为，除非管理得当，否则石油财富最终可能为俄罗斯带来的弊大于利。文章讲：“经济学家提醒人们注意‘资源灾难’。这个令人惊讶但有数字依据的理论认为：自然资源丰富往往有损一国经济增长。”

如何克服“荷兰病”或者所谓的“资源诅咒”呢？

1.要建立有效的产业结构，避免把国家的经济增长单纯地依存于一种资源之上。某种资源越多，越可能对这种资源产生依赖性，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利润空间寄托在此种资源上，从而缺乏对于科技进步的渴求。一个国家的经济应该建立一个有机的结构：既要发展资源产业，也要发展以资源为基础的加工业和制造业，更要发展服务业。

2.要进行技术创新。把从自然资源中获得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技术创新的基金，使国家的发展有技术进步的支撑。只有技术的不断创新，才能避免“荷兰病”。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有效的自主创新，通过自主创新越过“荷兰病”带来的陷阱。我国的社会经济要想长期地、可持续地、稳定地发展，就应当大幅度地提升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而自主创新能力要想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没有良好的基础研究作保证，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就是悬空的，是难以为继的。同样，没有强大的应用研究作支撑，自主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因此，自主创新的第一步就是要确立基础研究投入与应用研究投入的合理结构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



衔接机制。

第二，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讲，自主创新的主体应当是企业。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应当是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必要的投入，把社会特别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充分调动和发挥出来。政府的投入应当更多的是作为杠杆来撬动社会的投入，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政府在科技方面一元的投入往往可以带来三元的社会投入。

第三，处理好政府投入与政府监管的关系。现在，我们国家每年投入到科技方面的经费达到2000多亿元。但这些经费的使用效率如何？有多大比例真正用于新技术的研发？应当建立一个高效的科技经费的监管机构，由该机构负责对于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与管理，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这有利于国家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

第四，处理好引进来与自主创造的关系。自主创新不等于拒绝对外开放，而是要扩大对外开放。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要想有更大突破，应当在对外开放方面做更大的文章。过去说的引进来更多的是引进单一的新技术，现在应当从引进的结构上进行调整。（1）引进国际科技组织的总部，把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科技组织引进到中国来；（2）引进国际先进的科技研究的管理体制与制度；（3）对国际上一些具有科技资源的公司进行购并，运用资本手段获得自主创新的手段。在引进的同时，中国应当更多地参与国际高科技的合作研究项目，通过合作，获得自主创新的能力。

第五，处理好自主创新体制内部的关系。自主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内部，除了涉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外，还涉及应用研究与市场转化的中介体制问题。技术研发的市场化成功率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大量的、高效率的科技中介公司。我们的科技中介公司数量少，而且层次比较低，在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方面办法不多。今后应当大力推进科技中介公司的发展，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荷兰奇迹：一个创新型国家的经典案例

17世纪的荷兰人凭借着自己的创新赢得了世界经济的头把交椅。这种创新性有四点：1.发展服务贸易，充当世界贸易的转运使和中介人；2.发展“信息服务”产业；3.吸收新移民，促进社会职业分化和专业化；4.重视制度创新。这种创新对于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仍有启发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1月10日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到2020年，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进入创新型国家，这是令人振奋的宏伟目标。创新型国家应该是怎样的状况呢？让我们从荷兰奇迹说起。

16世纪下半叶，荷兰在英国与西班牙大战的过程中摆脱了西班牙的封建统治而获得独立。独立后的荷兰几乎是一无所有：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只有茫茫的大海日夜侵蚀着尼德兰的海岸。但是，荷兰人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的进程中创造了历史：荷兰成为了欧洲的经济领袖，荷兰的名声达到了如此的程度——在意大利米兰加工的天鹅绒只有运到荷兰，打着荷兰天鹅绒招牌才能卖个好价钱；阿姆斯特丹成为了欧洲的商品与交换的中心，它是贸易的司令部，是一个世界性的商场，“在这个商场里有五光十色的商品，莫斯科人、波兰人、瑞典人、丹麦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非洲人、希腊人和弗拉芒人在那里讨价，人群川流不息，有人搬进商品，有人扛走那些商品。”（法国学者佩雷菲特语）荷兰人是如何打破“初始不利”的条件而创造奇迹的呢？

概括起来，荷兰奇迹的背后是荷兰人的创造性和创新性。这种创新性有四点：1.发展服务贸易，充当世界贸易的转运使和中介人，从而使没有资源的荷兰成为贸易的强国。17世纪中叶，荷兰已经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商船队，拥有16000多只商船，其船舶总吨位相当于英、法、葡、西的总和。当时成千上万的荷兰商船航行在世界的海洋上，他们经营外国商品，充当各

地贸易的中介人并承担商品的转运业务，被誉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荷兰的安特卫普集中了全世界转口贸易的40%。2.发展“信息服务”产业。作为一种创新，荷兰也是信息和知识的交换中心。1984年，伍德鲁夫·施密特在一篇题为《贸易中心在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作用》的论文中，把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形容为“信息的股市”。商人之间的私人交流，官方交流，实业家的商务往来，前来寻求避难和进行研究的学者访问，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信息流和知识流的扩充和多样化。信息流和知识流的发展为荷兰人带来了无穷的财富。3.吸收新移民，促进社会职业分化和专业化。从1550年到1650年，移民到荷兰的人口不少于100万，仅仅是阿姆斯特丹每年就有近3000移民。这是一个奇迹。荷兰政府在鼓励移民的同时，鼓励社会的职业分层。1728年一个名叫伯利的学者分析当时荷兰的职业状况为：海上捕鱼和造船的就业人口为50万，农业和淡水捕鱼的就业人口为25万，加工业就业人口为80万，供货商80万人。4.重视制度创新。荷兰人创造了西方第一批有限公司形式的银行之一——威塞勒换汇银行，它是阿姆斯特丹金融生活的调节人；创造了向发明创造者颁发特许证书的制度，鼓励各种工业发明的出现。

荷兰奇迹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中国的自主创新要围绕着新型工业化道路来展开，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上要有大的突破。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需要非常多的自主创新，例如如何建设节约型社会，如何发展循环经济，如何使信息化能够带动工业化，如何使工业化成为服务业的助推力，如何发展中国的支柱产业，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破解程度，就是衡量中国创新水平的基本标准。

2.要围绕着资源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使自然资源的产业链条不断拉长。在延长产业链条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创新，使创新在各个产业领域无处不在。要围绕着有深厚基础的资源发展上下游的加工业，围绕着制造业创新发展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业。有了强大的加工制造业，就可以吸引众多的人才；有了人才，制造业的发展就会更加强劲。同时制造业可以催生出无数的产业机会，如汽车制造业可以带来汽车维修业、汽车广告业、汽车

美容业、汽车保险业、汽车洗车业、汽车媒体业、汽车金融业等等。我们要善于在产业融合上进行各种创新性活动。

3.要大力聚集专业人才，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人才的高度聚集。伦敦之所以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是因为那里聚集着80万的金融人口，纽约则有35万的金融人口。鼎盛时期的荷兰有50万人口在从事造船业。没有人才的高度聚集，就很难取得大的发展，也不可能成为创新型的国家。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杰出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群体，是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就必须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科学技术人才群体和社会科学人才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优秀人才队伍。中国要有上百万优秀的金融人才，金融产业就能得到大发展，金融创新就会不断涌现。

4.要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这既包括政府的制度创新，也包括法律制度的创新；既包括企业制度的创新，也包括公民权利制度的创新；既包括金融制度的创新，也包括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这一点，胡锦涛同志讲得非常清楚：“要实施激励自主创新的各项政策措施，及时研究和解决科技工作和科技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努力创造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和各方面条件。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和执法工作，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各种行为。”这些制度和政策只要落实到位，中国13年后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是有充分保障的。

捷克现象与中国股市

对于大多数老股民来讲，中国股市曾是一个伤心之地。从2001年到2006年底，有超过80%的老股民被牢牢地套进股市。中国股市为何如此令人伤心？因为中国股市存在种种不健康的因素。这很像“捷克现象”。1997年时，捷克曾有1716家上市公司，但到了1999年初，只剩下301家，高达82%的公司退市——这便是世人震惊的“捷克现象”。中国股市虽然没有达到如此高的退市比例，但其中各种各样的掏空现象却比比皆是。

1997年之前，在所有的经济转轨东欧国家中，捷克的私有化模式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因为私有化之后的捷克经济很快出现了复苏，不仅取得了经济增长，而且通胀低、币值稳定。1993~1996年间，捷克的GDP年均增长14.8%（明显好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被国际评估组织认为是前华约国家中最稳定的国家。捷克模式的要点是：“在起点平等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在规则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适合的所有者”。通过证券分配或“大众私有化”进行了快速而民主化的产权改革。其做法是将国有资产证券化，再将该证券几乎无偿地（要交纳一定的领表费用）分配给每个年满18岁的公民，然后由投资基金吸收公众的证券，形成主要由投资基金行使控股股东职能的产权模式。当时的捷克政府否定了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或将企业的产权转为职工持股的产权模式。该模式解决了经济转轨初期的起点公平问题，并克服了资金短缺问题，因而相比其他转轨国家，捷克的私有化进行得最快，社会摩擦最小，成本也比较小。但好景不长，1996年之后，在证券市场上，挖空上市公司的行为不断被揭露，有很多上市公司因此而退市。1997年时，捷克曾有1716家上市公司，但到了1999年初，只剩下301家，高达82%的公司退市——这便是令世人震惊的“捷克现象”。与此同时，宏观经济一蹶不振，从1996年起，当年的GDP增长率下降40%，1998年变为负数。捷克经济陷入停滞，增长率剧降，宏观经济指标恶化，捷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失业增加。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矛盾

加剧，一直保持稳定的捷克政局也随之动荡。

我国股市自2001年6月的沪综合指数2245点调整以来，到2006年6月，指数也几乎“拦腰一刀”了，同时又是沪综指创下7年来的新低，可以说是我国股市有史以来调整幅度和跨度最大最长的一次。股市在如此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成长，就可能重蹈震惊世人的“捷克现象”的覆辙。尽管从2006年底以来，中国股市已经开始步入牛市，但中国的股市暴露出种种问题，有些地方很像当年捷克的股市。例如上市公司掏空问题突出，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法人违法问题严重。据《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8月8日的文章，从2005年1月到8月，已有25名上市公司的高管落马，涉及上市公司17家，其中一把手13人，如科龙电器的董事长顾雏军、白云山的董事长李益民等。每年都有一批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被抓、被谴责。据《财经》杂志报道，2006年3月1日，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原南方证券总裁、董事长刘波，原南方证券总裁郭元先被深圳公安机关逮捕，涉嫌罪名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中国股市如何避免“捷克现象”而健康发展呢？

其一，要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强化对上市公司的市场约束。2006年12月14日，阔别了五年之久的“股市大顶”2245点终于被突破，中国股市创出了一个新的记录；从2005年底的低点起步，A股市场一扫5年来的阴霾，一年间涨幅超过100%。可以讲，股权分置改革等制度变革是引发2006年中国证券市场出现大幅上涨的外在动因，由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提高则为新一轮牛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要加大证券监管部门监管的力度，对于挖空思想掏空企业资产的行为进行坚决打击。越是在股市繁荣时期，监管部门就越要加大监督力度。

其三，要进一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更加完善，企业对于违法行为能够进行自我纠正。

其四，要加大对于保荐机构的管理，使它们对于所保荐的企业存在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并督促其加以改正。

越南道路与越南奇迹：背后的故事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越南。昔日的贫穷小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明星。

根据2006年4月越共十大的规划，今后5年越南经济的年均增长率目标将设在7.5%~8%。到2010年，越南要赶上印尼和菲律宾，2020年要赶上泰国，成为亚洲“第五虎”。

越南，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体。

越南道路：胡志明的道路

澳大利亚皇家军事学院学者约·维尔钦斯基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词典》的书。在关于胡志明的词条中，作者是这样写的：“胡志明（1890~1969年），越南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革命领袖和天才的组织者。由于他的毕生奋斗，起先在北越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后来在共产党领导下重新统一了越南。他胸怀大志，充满爱国热情。他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学获得的。从1917年到1925年，他在欧洲，主要在法国、英国和苏联生活与学习。他还是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法共1920年从法国社会党分裂出来时，他就加入了法共。1923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并积极参加了共产国际的活动。1925年他回亚洲后，一度在广州担任鲍罗廷的翻译。1930年胡志明创建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即现在越南共产党的前身。”（约-维尔钦斯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词典》，东方出版社1988版，第255~256页。）作者基本上阐述了胡志明早期革命活动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胡志明以一艘邮轮的杂役工的身份前往美国，在美国他接触到了《美国独立宣言》的革命精神。这一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精神一直伴随着胡志明。1945年夏秋之间，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皮特少校、加拉格尔陆军准将和法里斯上尉担任胡志明领导的越盟的观察员。皮特后来回忆说，当时胡志明起草了一个越南的独立宣言，其思想很类似于

美国的独立宣言。这一点，美国威廉姆斯大学法国思想史教授苏珊·邓恩在1999年出版的《姊妹革命：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启示录》中有十分精彩的描述。邓恩说：1945年9月的一天，河内的街道上，“一个看上去弱不经风的男人（指胡志明）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人人生而平等’，‘创世主赐给了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他解释说，‘这个不朽的声明，是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在《独立宣言》中做出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意味着：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所有的人都享有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权利’。”邓恩接着说：“但这并非全部。正如杰斐逊在宣读有关不可剥夺之权利以及自由的不朽宣言的同时，也一一列举并强烈谴责了乔治三世和英国议会对美国人民所犯的罪行，胡志明也表达了越南人民对于他们的殖民者——法国的仇恨。他的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提醒他们，法国仍然试图破坏越南的完整，要把越南人为地分割为三个政治地区：东京、安南、交趾支那。法国强加给越南人民不公正的税收负担；强行征用人们的土地、稻田和森林；不依照法律办事，只是依靠行政法令统治；法国建起来的是一座座监狱而不是学校，而且在印度支那最黑暗的时刻，法国把越南抛弃给了日本人。”邓恩又讲：“杰斐逊在他那伟大宣言的末尾，宣布美国立即解除与英国的一切政治联系，并宣布独立。‘我们……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这里庄严声明并宣布：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是，而且理应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胡志明努力仿照杰斐逊的语言：‘我们，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越南有权利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而且已经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苏珊·邓恩《姊妹革命：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启示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212页。）

邓恩看到了胡志明在1945年发表的越南独立宣言与杰斐逊在1776年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一些相似的语句，尽管1945年不是1776年，越南不是美国，胡志明也不是杰斐逊。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在美国，胡志明开始了其革命生涯。胡志明之所以进行革命，与越南的社会性质是分不开的。越南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从此成为一个半封建的、殖

民化的国家。这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无比黑暗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暴虐是非常惊人的，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从思想文化到宗教教育，殖民主义者无不对越南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压迫和压制。在胡志明的第一部严肃的政治宣传作品《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中，他描述了法国殖民主义体系的特点，详细分析了该体系的不公正性以及殖民主义统治的残暴无情。最使胡志明本人感到气愤的是殖民地人民被逼迫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写到，这些位居二等公民地位的“肮脏的黑鬼和肮脏的安南人”转眼之间被提到了“法律和自由捍卫者”这样崇高的地位，并被逼迫去为他们自己本来就已经被剥夺掉的权利和自由而战。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稻田、离开他们的羊群、离开他们的妻儿，跨过大洋，战死在欧洲的战场上”。胡志明认为，法国的殖民统治不仅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而且也旨在消除他们的团结意识和国家意识。更为阴险的是，法国殖民主义的策略是要鼓动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去反对另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逼着阿尔及利亚人在越南打仗，逼着越南人在非洲为法国的利益而战。

不甘心做亡国奴的越南人民，不断地进行着斗争，前赴后继，但由于这些爱国运动缺乏正确的路线以及没有革命组织的领导而失败，处境格外黑暗而且似乎毫无出路。革命志士不断探索，胡志明是其最杰出的代表。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指出，帝国资本主义的暴虐就准备了土地，社会主义只要做一件事，就是为解放事业播种而已。他在1921年说：“资本主义殖民者有系统的毒害并不能使生命力瘫痪，更不能使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思想瘫痪。来自工人的俄国、革命的中国、战斗的印度的风暴，正在给印度支那人民解毒。……印度支那人进步得非常奇妙……在印度支那人民消极服从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正在沸腾、咆哮的东西，时机一到，就会非常厉害地爆发出来。优秀分子有任务促使时机快速到来。资本主义的残暴已经准备了土壤，社会主义只要播下解放的种子就行了。”（胡志明：《为了独立自由、为了社会主义》，越南外文出版社河内1971年版，第16~17页。）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27岁的胡志明来到巴黎，学习研究“那些位于自由、平等、博爱背后的东西”。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在法国的凡尔赛宫举行会议，讨论未来的和平条款。胡志明只身来到了凡尔赛。他来凡尔赛，主要是受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14点建议的鼓舞，尤其是威尔逊承认国家的自决权。胡志明向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关于越南民族自决权的方案。尽管他没有提出越南独立的内容，但他提出了“八点要求”：越南人和在印支的法国公民一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赦免政治犯；依照法律而不是依照行政命令来治理国家；在法国国会中派驻永久的越南代表团，以及一些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提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完全针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思想统治的。当时法国当局禁止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翻译成越南文。在越南的图书馆，有关法国革命的著作只有法文的，找不到越南语的。

胡志明在凡尔赛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没有得到威尔逊的任何回应，这使他非常失望。但是胡志明却引起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注意，其中包括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勃鲁姆。于是胡志明参加了法国社会党。

不久以后，胡志明从巴黎来到了莫斯科。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列宁是“普遍友爱的化身”，是“对所有受压迫民族进行兄弟般援助的法国革命诺言”的继承者。胡志明写到，列宁解放的不仅仅是他本国的人民，他还给世界上所有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民指明了方向道路。他在1925年发表在苏联《红色》杂志上一篇题为《列宁和各殖民地民族》的文章中指出：“列宁在苏联国内解决了非常复杂的民族问题，这是对各殖民地国家进行宣传的有力武器。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丧失权利的各殖民地民族的历史，列宁是一个创造新生活的人，是照亮全体被压迫民族走向解放道路的灯塔。”（胡志明：《为了独立自由、为了社会主义》，越南外文出版社河内1971年版，第37页。）他把列宁主义称为越南人民的“指南针”，称为“照亮我们的前程，指引我们走向最终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红太阳。”（苏珊·邓恩《姊妹革命：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启示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正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胡志明开始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者。胡志明由于长期在共产国际中工作，比较了解共产国际对于东方国家非资本